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欧阳修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欧阳修

【散文选集】

王宜瑗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修散文选集/(北宋)欧阳修著;王水照,王宜媛编.—2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782-6

I. 欧... II. ①欧... ②王... ③王...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I26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3291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74 千字

2005年5月第2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6.80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王水照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又达到了高度繁荣的新的质变点。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批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化名人。他们视野开阔,通古博今,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领域的巅峰,其本身往往是一代文化的结晶和代表。欧阳修就是北宋前期最早升起的一颗文化巨星。他作为当时文坛盟主,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奠定了宋代散文的群体风格。他和梅尧臣、苏舜钦一起,开创了有宋一代诗歌的新面貌。在宋初词坛上,他和晏殊所组成的晏欧词派居主导地位。他又主持《新唐书》的编撰,并独立完成《新五代史》,在我国众多的史学家中,成就卓著。他以《易童子问》、《诗本义》等经学著作,开创了以务明大义、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宋学”,与传统的神化经典、恪守传注的“汉学”相抗衡。他又是金石考古学的开拓者,我国第一部诗话著作的作者。他当之无愧地荣膺散文家、

诗人、词家、历史学家、经学家、考古学家、诗歌评论家等多种称号。而作为散文家的欧阳修，他流传至今的五百余篇作品，是他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部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引人注目。

一、古文创作初露锋芒(1031—1034)

欧阳修(1007—1072)现存的最早散文作品，写于宋仁宗天圣年间，在六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勤奋地写作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散文创作道路、散文特点的形成和成就的获得，跟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直接关联，也跟北宋的整个政治环境和社会情势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散文创作、古文运动和政治革新三者在他身上是交互影响、同步行进的。

引导欧阳修走上古文写作之途的是韩愈。欧阳修四岁丧父，随母去随州投靠在那里任推官的叔父欧阳晔，遂长居该地。他在城南李尧辅家，第一次得见韩愈的文集：“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记旧本韩文后》)韩文在他孤贫力学的生活中不啻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唐中叶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成就突出却后继乏人，不久骈文重又抬头，到五代乃至宋初，浮泛靡丽的骈文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一切官场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牒，以及科举程文等皆用骈文。欧阳修为准备应举，自然也把学习骈文

作为重要日课。他追述说：“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俚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然。”（《与荆南乐秀才书》）正是以“顺时取誉”为目的的僵死卑弱的骈文为参照物，韩文“深厚而雄博”、“浩然无涯”的美学特征才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天圣元年（1023），十七岁的欧阳修参加随州州试，试题是《左氏失之诬论》。他的答卷尽管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等“奇警之句”流传后世（《东轩笔录》卷十二），却以落官韵被黜。复又重读韩集，“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记旧本韩文后》）立下了尽早摒弃骈文这块敲门砖，潜心研治韩文的志愿。这表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固然跟唐代古文运动一样，也标举明道师经的旗帜，但更具诱惑力的契机却是对韩文艺术特性、美学风范的钦羨和认同，这也预示着欧阳修今后的文论思想朝“重道更重文”的方向发展。

天圣八年，他终于进士及第，次年三月到洛阳出任西京留守推官，直至景祐元年（1034）秩满。这三年间，他积极参与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诗文革新活动，是他古文创作的发轫期，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当时钱惟演任西京留守，大批文人学士聚集在他周围。从欧阳修《七交·自叙》、《书怀感事寄梅圣俞》等诗中，充分反映出名士荟萃的盛况。这个具有大致相同文

学好尚的文人集团,其实际领袖是通判谢绛,重要成员有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梅尧臣《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云:“是时交朋最为盛,连值三相(指李迪、钱惟演、王曙)更保厘。谢公主盟交变古,欧阳才大何可涯。我于其间不量力,岂异鹏抃蒿鹳随。”在《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中又说:“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俨然与韩、柳、元、白的元和时代先后比美,蔚成文学史上的大观。

这个颇为松散的文人群体虽然主要活动不过是“文酒聊相欢”、“崎岖寻石泉”的宴游生活,且尚未提出明确的诗文革新纲领,但毕竟是依照一定的文学趋尚而发生互动关系的共同体,也不能离开宋初以来诗文革新运动的整体发展。柳开、王禹偁等人首先对浮艳空泛的“五代体”发起攻击,提出复兴“古文”的要求。然而,以大中祥符年间《西昆酬唱集》结集为标志,西昆体时文又逐渐取代宋初早期古文中的地位。这又引起孙复、石介、穆修、苏舜钦等人的反对,西昆体时文的影响遂日趋减弱。更加上天圣七年仁宗下《贡举诏》戒除文弊,“比来流风之弊,至于荟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以后明道二年、庆历四年又下诏重申)这一行政措施跟文坛发展要求完全吻合,因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正如欧阳修一再指出,皇帝下诏后,“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苏氏文集序》),“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西汉之风矣。”(《与荆南乐秀才书》)可以说,欧阳修是在比较顺利的条件下开展古文运

动和从事古文写作的，比起韩愈面临的“挽狂澜于既倒”、“摧陷廓清”的严峻任务来，他的困难和阻力要小，这也直接有助于他的中和之性、情韵之美的散文精神的形成。

洛中三年对欧阳修的散文创作道路发生过一锤定音式的重要作用。第一，编校韩集，写作古文。他自述：“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记旧本韩文后》）而欧阳修本人也从此学为古文，摒绝骈文。他说：“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从此，古文成为他抒情述志、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终生未渝。

第二，崇尚“道”的实践性性格。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韩愈论“道”，主要指儒家的礼治秩序、伦理关系，高言宏论，神圣莫犯。欧阳修却强调“切于事实”，突出“道”的实践性性格，大大缩短了“道”和人们的心理距离。洛阳时期他表达文论思想的文字不多，但已初露端倪。如明道二年写给求教者张棐的《与张秀才第二书》指出，“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空谈性理或放言圣道的厌弃，表现出贴近现实政治和实际生活的倾向。

第三,提高知名度,声誉鹊起,为日后主盟文坛创造条件。一切文学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时才取得有实际意义的存在,文人集团作用之一,在于加强了这种文学交流的过程,扩大了作品的影响,从而帮助自己的成员获得社会的认可。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说:欧阳修“补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由此而增强了他在文坛的号召力和威望。

第四,孕育了他独特散文风格的胚芽。文学创作是文人集团活动的中心,在互相切磋、激励、竞争中,往往培养出一种新的欣赏习惯,使之成为较稳定的审美爱好。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云:钱惟演“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圆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记此事略有差异,他说:“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欵(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这两则文坛逸事,具体细节容有出入,但崇尚“简古”、“完粹有法”,力忌“格弱字冗”确是欧阳修散文风格的特点之一,也是他文论思想的一个要点(以后在《论尹师鲁墓志》等文中还有更多的发挥)。同时,文友间的切磋琢磨也有助于他散文风格的日趋成熟。他在嘉祐八年《集古录目录》自跋中说:“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隽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辩论精博,余每有所

作，二人者必伸纸疾读，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得者也。”时隔三十年，对“谢、尹之知音”仍拳拳于怀如此，足证切磋之功。尤应强调指出，对洛阳文人集团的追念成为欧阳修巨大的精神财富，这对形成他散文主体风格即“六一风神”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六一风神”的审美核心，就是抚追今昔、俯仰盛衰、沉吟哀乐的情韵意趣，这集中表现在他为洛阳友人所作的墓志、祭文之中。如果不是以存亡离合感叹成文，不是把作者自身纳入其中，就不可能把这些实用性的墓志、祭文写成情辞并茂、声泪俱下的绝妙文字。本书所选《张子野墓志铭》就是一例。近代文学家林纾说：“欧文之多神韵，盖得一‘追’字诀。追者，追怀前事也。”又说：“欧公一生本领，无论何等文字，皆寓抚今追昔之感。”（《选评古文辞类纂》）堪称一语中的。对洛阳盛游的追思，对今昔盛衰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已成为形成他主体风格的切入口和契合点。

洛中三年是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初步丰收时期。现存这时期各类文章三十多篇，其中有不少富于文学性的散文。与上述情况相对应，这些散文的显著特点，一是学韩。如《杂说三道》、《伐树记》、《戕竹记》、《非非堂记》、《养鱼记》等，不仅《杂说三首》沿袭韩愈《杂说四道》的题目和手法，而且其他几篇“记”实质上属特殊的“杂说”寓言，都借用具体事例阐发某种哲理或人生思想，而这又承受了《庄子》的思想熏陶。二是崇尚简古的风格。这些文章大都篇幅较短，文字洗炼简洁，要言不烦。《戕竹记》结尾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由小引大，含意颇

深;《养鱼记》结尾云:“感之而作《养鱼记》”,所“感”为何,不明言而妙在不言之中。三是多骈偶句式。如“且戕且桴,不竭不止”,“服上官为慢,齿王民为悖。”(《戕竹记》)“不方不圆,任其地形;不甃不筑,全其自然。”(《养鱼记》)大抵受积习所使,摇笔自来,他后来才自觉吸收骈文的艺术长处,达到另一境界。总之,这时的散文还处在练笔阶段(这可能是大都未收入他亲自审定的《居士集》、而被后人编入《居士外集》的原因),但已初步显露出构思运笔的较高才能和自己的独特风格。

二、革新弊政的志士,振兴文运的宗师 (1034—1045)

从景祐元年(1034)到庆历五年(1045),是欧阳修政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又一个重要时期。他历任馆阁校勘、夷陵令、乾德令、滑州通判、知谏院、知制诰等职,经历了在朝——外贬——在朝的曲折过程。两次在朝,他积极参加了范仲淹等革新派和吕夷简、夏竦等守旧派的激烈的政治斗争,而第一次夷陵被贬对他的思想、性格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朝比之以前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朝代。这一方面对于巩固宋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挥霍享

受,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币纳绢,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几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内外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封建士大夫中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最初掀起的一场政治改革。欧阳修在景祐年间严斥附和吕夷简的谏官高若讷,为范仲淹贬官饶州鸣不平,因而自己也遭外贬夷陵的打击;而在庆历新政期间,他更积极出谋划策,努力于舆论宣传,与参政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起,成为新政的核心人物。这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为进取的时期。

宋代的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革新运动的一翼而出现的,因此具有鲜明的教化辅政的目的。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时务书》中,就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强调文章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要求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兴复古道”,“救斯文之薄”。在庆历新政时,更兴建太学,改革科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注重策论经义,使“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欧阳修《条约举人怀挟文字劄子》)。随着政治革新浪潮的推进,古文运动也随之扩大了社会影响,吸引了众多的士人从事古文的写作。同时,欧阳修在文坛的地位也日益提高,终于成为公认的领袖。他自己在宝元二年所作的《答梅圣俞寺丞见寄》诗云:“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大概因该年谢绛死去,故而和梅尧臣二人分别负起“文会”、“诗坛”的领导责任,这可能还属于某一局部的文人范围之内。而范仲淹于庆历八年所作的

《尹师鲁河南集序》，则概述宋初以来的文坛大势说：“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柳开）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穆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逮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他是从文坛全局立论，肯定欧阳修在当时转变文风中的关键性作用。

与这种社会思潮和欧阳修文坛地位相适应，他的文论思想也臻于成熟。《与荆南乐秀才书》、《答孙正之第二书》、《答吴充秀才书》、《答祖择之书》这些指导各地士子的书简以及随后的《苏氏文集序》、《送徐无党南归序》、《答宋咸书》等文，都是有代表性的文论之作。他仍然标举“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的重道旗帜，但对“道”的内涵作了新的阐述：一是继续发挥《与张秀才第二书》中“道”必“切于事实”的思想，强调“道”必须和实际生活中的“百事”相联系，反对“弃百事不关心”（《答吴充秀才书》），重视“道”的实践性性格；二是提出“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的思想（《答宋咸书》），对“圣人之言”，其着眼点不在它所规定的人伦关系中尊卑名分的等级性，而是突出其中的感情联系和交流，不使感情因素被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所吞噬。这就把抽象的、理念性的“道”，转换成具体的、实在的、充满情性内涵的“道”，与他散文中“信实性”和“抒情性”的特点正复一致。

其次，强调“文”的独立价值和作用。他说：“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

第一书》)又说:“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都从作家才能或文体、风格的不同,来说明道是不能完全代替文的。他还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提出“事信言文”兼重的命题,肯定“文采”对传之久远的重要作用。这里有必要弄清“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两句话的含义。前句来源于“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的古训,后句又与道学家“玩物丧志”说相类。实际上,前句主要是“充道为文”之意。他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答祖择之书》)这是对韩愈《答李翊书》“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的发挥,其主旨在于从文人修养的角度来讲文学才能的提高、作品艺术感染力的获得。后句是从整篇文章“三不朽”的题旨出发,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必须以“立德”为本,而且徐无党已有文名,“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同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在他心目中,首先应以道德家、政治家自期,其次才是文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的轻视和否定。他后来在论及为杜衍作墓志时说过:“平生知己,先相公(杜衍)最深,别无报答,只有文字是本职,固不辞。”(《与杜沂论祁公墓志书》)说明他终究是位毕生“尽心于文字”的文人。

这时期的散文创作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与他的政治活动紧密配合,他写了不少有关政治革新的文章,仅

奏议就多达六七十篇，政论有《原弊》、《纵囚论》、《本论》等，《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更是传诵一时的名作。这些文章词气严正，说理透辟，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凛然的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也是庆历新政的可贵的历史文献。第二，由于文名卓著，他应请写了不少墓碑文。这时期有名的有《张子野墓志铭》、《黄梦升墓志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等，这些墓主大都很少有勋业政绩可以称述，他因而采取从虚处落笔的手法，或以交游聚散感叹著文，或从亲人口述笔录成篇，充满了缠绵呜咽的情韵，为墓志铭的写作别辟一途。他以后写的《尹师鲁墓志铭》、《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并序》等，则强调简古的文字风格和突出大节的写作原则。然而，精心选择富有生活气息的典型事例，以表现人物的精神性格，则是他墓碑文的共同特点。第三，与曾巩擅长目录序、王安石工于经义序各异其趣，欧阳修以精于诗文集序著称。这时期所写的《释惟演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开了此类书序的先河。这两篇为佛门中人所作的诗文集序，颇受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以客映主手法的影响，但已显出学韩能化的境界。以后他又陆续写了不少书序名篇，对这一文体的写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艺术经验。

三、宦途的再贬，风格的成熟(1045—1054)

从庆历五年(1045)到至和元年(1054)，是欧阳修第二次被贬外任时期。范仲淹为首的新政在守旧派的攻击下不幸失败。庆历五年，欧阳修又为“盗甥”的流言不明